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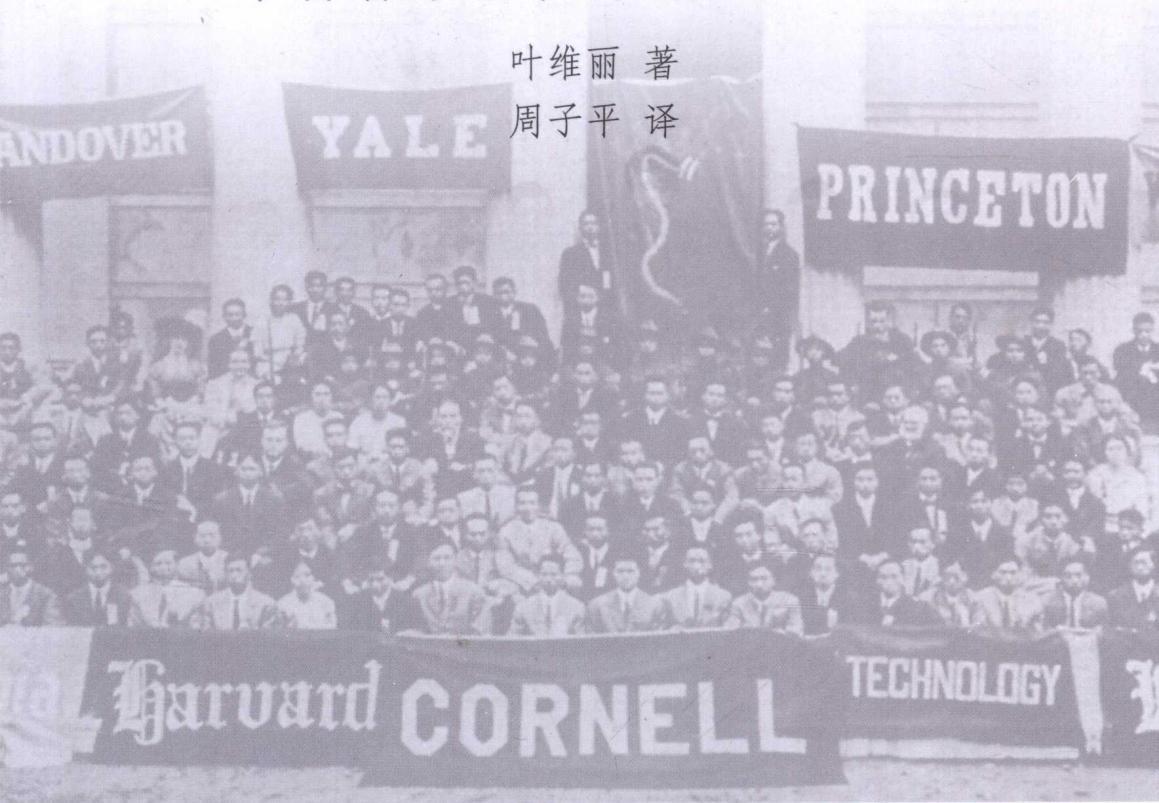
留学史丛书

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

◇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1900-1927) ◇

叶维丽 著

周子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留学史丛书

叶隼 主编

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

叶维丽 著

周子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0-39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叶维丽著;周子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留学史丛书)

ISBN 978-7-301-20058-2

I. ①为… II. ①叶… ②周… III. ①留学教育—教育史—中国—1900—1927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6962号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 1927, by Weili Y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200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

本书中文版权归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

书 名: 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

著作责任者: 叶维丽 著 周子平 译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河上图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058-2/G · 33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6.75印张 268千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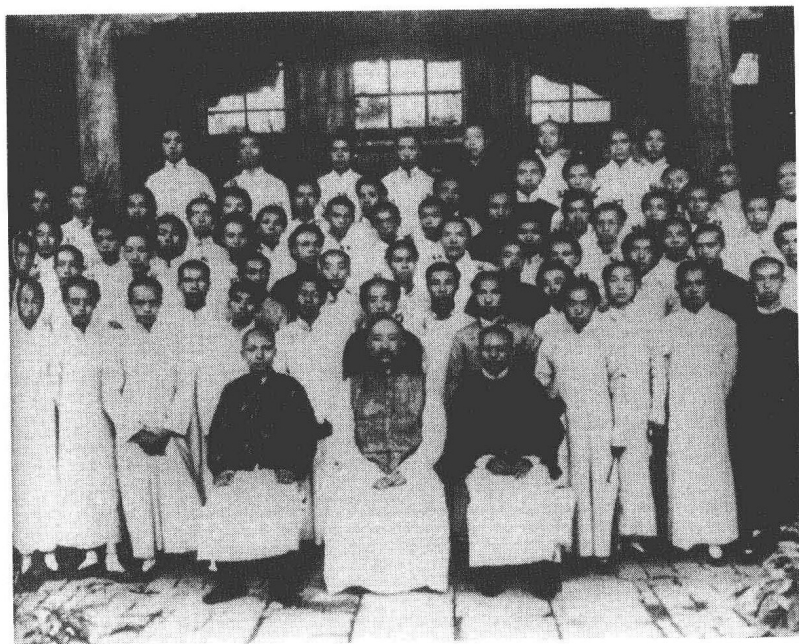
定 价: 3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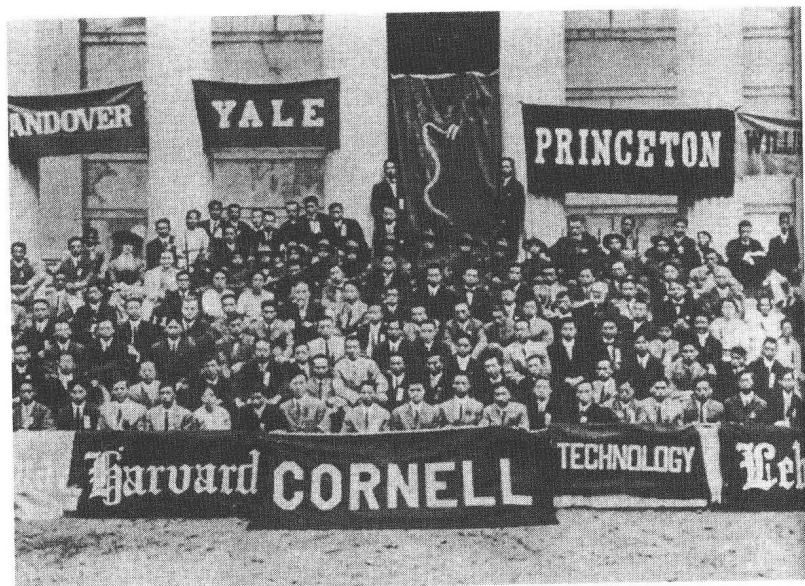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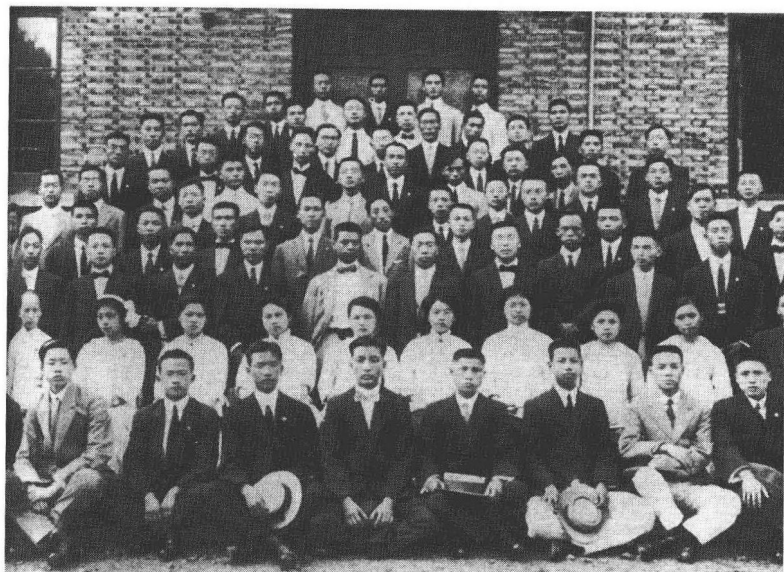
献给我的母亲白天和父亲方实



照片1 庚款留学生赴美前在北京合影(1910)



照片2 中国留美学生会东部会会议(1911,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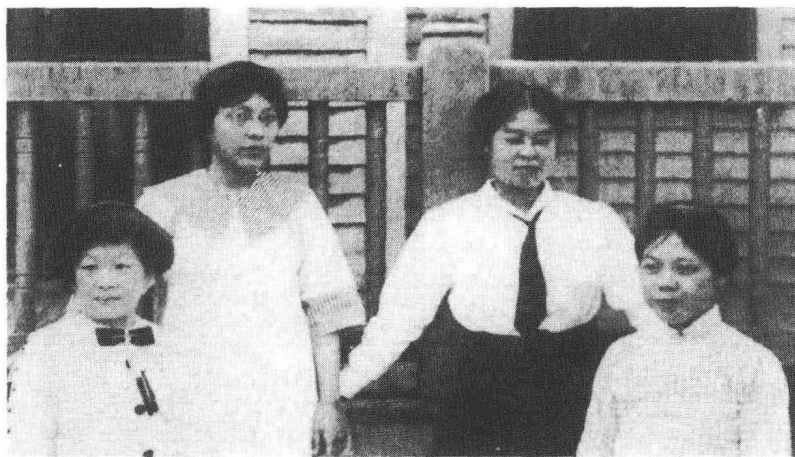
照片3 1914年庚款留学生赴美前在沪合影
(其中包括庚款留学教育计划的首批9名女留学生)



照片4 许金匄1984年费城女子医学院毕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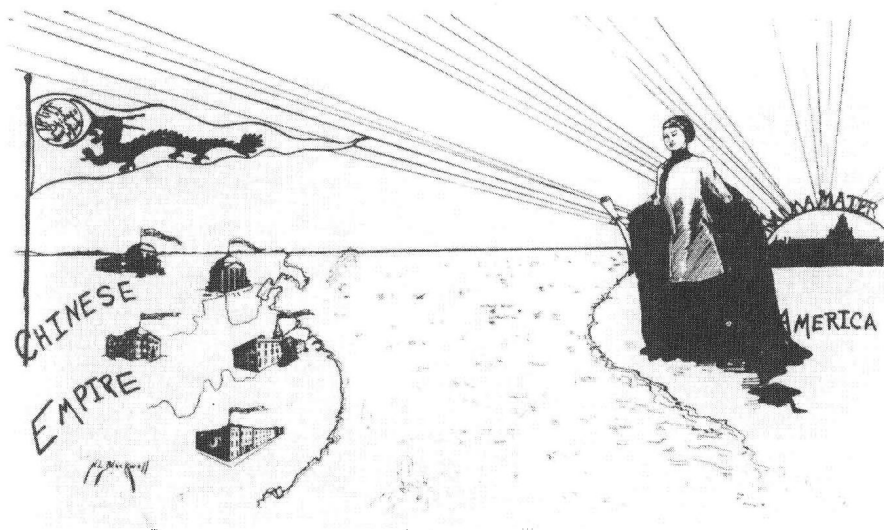
照片 5 石美玉与康爱德及五名护士摄于江西九江但福德医院门前
(康爱德为后排左首站立者,石美玉为后排右首站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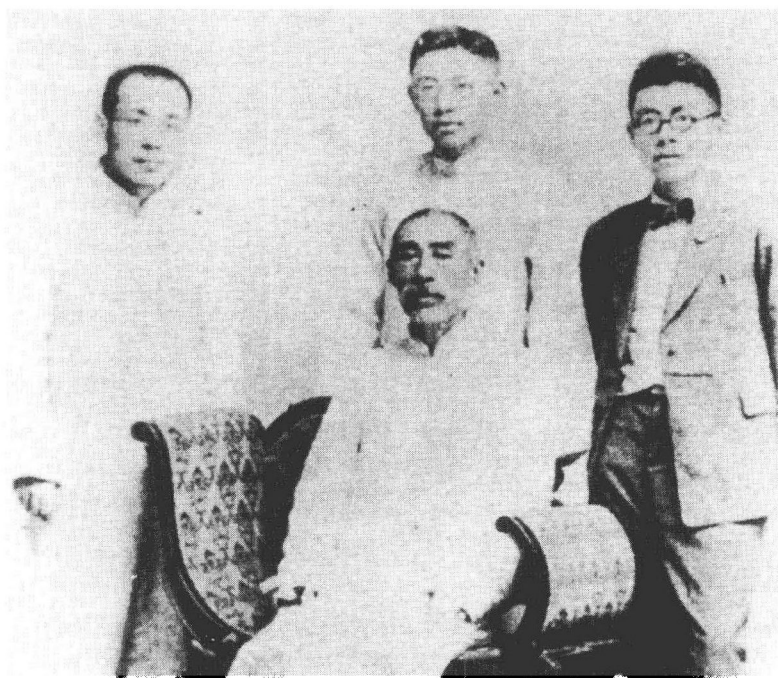
照片 6 威尔斯利学院中国留学生会(右坐者为胡彬夏)



照片7 留美女学生陈衡哲(1914—1918)



图片8 她的理想(原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女留学生特刊)



照片 9 1922 年闻一多赴美前与家人合影(右首站立者为闻一多)



照片 10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划艇队(1918)



图片 11 庚款留学教育计划开端
(原载《留美学生月报》1910 年 1 月
号。身着西装的中国男孩脚下橄榄
球上的英文为“少年中国”)



照片 12 李景汉(20 世纪 80 年代
摄于北京家中)

照片 13 罗隆基(1946)



照片 14 竺可桢(1963 年摄于广西阳朔)



照片 15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
顾维钧(大约 1910)



照片 16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胡
适(1914)

《留学史丛书》总序

叶 隽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始终是居于枢纽地位的推动器。文化的异质性越强,外来刺激的作用力往往越深。故此陈寅恪先生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此理不仅适于国人,对人类整体文明同样具有典范效应。而就这样一种文化交流而言,要言之可分两种,一为达摩弘法,一为玄奘取经。前者是主动走出去的“宣经传道”,有一种宣示宗教福音的使命感在内;后者则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求知向学”,更具追求真理的孜孜之诚。可一旦学术(此处是佛教)中心转移,其情况又变,即为鉴真东渡、阿倍入唐。师、弟位置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但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其要义当在“采玉他山”,而非“好为人师”。就此看,我们当然可以为隋唐时代的四海来朝而兴奋自豪,但更应关注由法显至玄奘的求学路径。贞观盛世之际走向西域的玄奘,正充分表现了我民族文明求知于世界的“煌煌大度”。正如当代美国虽为世界留学生汇聚之中心,但走向世界的美国学生也并不少见。

如果说以上表现的,是东方文化范围内以佛教为核心的知识中心场域迁变过程的“代表现象”,那么随着世界场域的整体形成与西方强势背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知识场域转向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我们还是将目光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1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集中到随着现代科学与学术制度发展而形成的近距离时段中来。19 世纪初期的洪堡改革一举确立了德国大学在世界学术与科学场域的中心地位。而有趣的是,“到 1900 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 1 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①。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 1930 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少,一个基本事实就是,19 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是本国的留德学生。

此处仅以中国之求知于世界为例,稍作探讨。近代中国虽然早已有有识之士如容闳等提出派遣留学,并有高层政治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张之洞等予以呼应,但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仍远超乎后世想象。故此,从官派留美幼童到留欧船政生乃至轰轰烈烈的留日潮,虽不乏优异人物出现,但往往属于个案现象,就整体言则往往难免或“浅尝辄止”、或“鱼龙混杂”、或“见木不见林”等弊端。而其时中国面临的老大帝国之病与难,使得留学所承载的功利化倾向暴露无遗。早在 1910 年代,身为留美学生的胡适作《非留学篇》,对留学提出异议:“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度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②此处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其特殊语境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能作为一种求知向学的纯正心态。到 1920 年代,潘光旦撰《留学生问题》,继续追问:“我们最先要问的是:年年岁岁有大批留学生出洋,到底有没有一个尽期?”^③对中国留学史深加反思,其致用思绪表露无遗:“我国留学运动,与日本大致同时发轫,但是就成绩而论,便不可同年语了。这是谁的过失?”^④这样一种比较视野的纳入,当然很有参考价值,但

① [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第 3 页,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

② 胡适:《非留学篇》,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本,1914 年 1 月。

③ 潘光旦:《读书问题》,第 18 页,上海:新月书局,1931 年再版。

④ 潘光旦:《读书问题》,第 19—20 页。

中、日近代留学史的成绩或许还有待“百年之后论高下”。毕竟，一时之权力得否，不能作为终极评价的客观标准。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①，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留德群体，最后将日本带向了何方呢？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诚哉斯言！可具体言之，对外来资源究竟是“全盘照搬”还是“批判接受”，这是事关根本的大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并成为世界史上唯一一个作为古国而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就在于其兼收并蓄、博大能容。诚如蒋梦麟所言，“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②。可这样一种吸收能力是如何表现的？它究竟有无特定的规律可循？对当下的中国发展进程来说又有怎样的资鉴意义？若要探讨这样一些本质问题，留学史无疑提供了最佳对象。

自舒新城1928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以来，中国的留学史研究可谓勃然而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国内对留学史的研究显然更上台阶，不仅论文数量众多，而且出现了较有分量和深度的著作。对此领域作出贡献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不仅基本的史实得到梳理，而且也开辟出很多具体而深入的论题；但此种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无从呈现。而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角色呈现又是如何与其留学背景（兼及学术与整体）产生深层的思想关联，更是值得具体探讨、很可能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的最佳命题之一。

可喜的是，外国学术语境里对中国留学史的兴趣与贡献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不但实藤惠秀写出了那部被费正清誉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兼“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③，而且德、法、

① 有论者进一步认为：“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北京，第76—77页。

②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载明立志等编：《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3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③ 《译序》，第2页，[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美等国学人在相关领域也各有贡献,诸如韩尼胥的《1860—1945 年中国留德学生的历史 and 影响》、Stacey Bieler 的《“爱国者”或“叛徒”——中国留美学生史》^①、森时彦的《留法勤工俭学小史》等^②,当然其中也不乏华裔学者或留学生的身影,如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③、王枫初的《移民与政治:中国勤工俭学生在法国 1919—1925》^④、Ye Weili 的《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 年的中国留美学生》^⑤、孟虹的《中国人留学德国教育(1861—2001)》等都是^⑥。作为一种明显的跨文化群体的研究,在日、法、德、美等不同的学术语境里,虽然都关注的是中国人留学史,却显然更注重留学国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是很可与国内学者的视角成“相辅相成”关系的。

既然如此,我们仍不禁要追问,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史反思视域中,推出一套“留学史丛书”,其意义究竟何在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引进世界学术范围内的他山之石;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推陈出新”,为汉语学界进一步推动留学史研究助一臂之力。具体言之,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尝试,能够兼顾以下几个视角:

一是中国与世界。我们不仅要探索以自身为主体的历史,同样也要关注作为世界文明整体的助推器的世界留学史研究。当中国正在经济、政治诸方面崛起于世界,世界也在以一种超常的眼光期待中国之时,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大国气魄”。譬如说,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即使“身不关己”,也应当予以关注,如以上提及的美国人的德国留学史,就颇值得探究;同样,日本在近现代崛起过程中求知于世

① Bieler, Stacey: “Patriots” or “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2004.

② [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史会来等译,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③ W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West, 1872-1949*.

④ Wang, Nora: *Emigration et politique: l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19-1925*.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⑤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 年的中国留美学生).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⑥ Meng Hong: *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 Wien: Peter Lang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5.

界的留学史,也足为中国人留学史之最佳参照。即便是在我们已有相当积累的中国留学史领域,也要特别强调一层“重思”的意义,至少应当注意到涉猎国别的全面性,即由欧洲主要国家如德、法、英拓展到美、日、俄等世界性大国;并进而考察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西方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其他东方国家如印度、埃及的中国人留学史。此中特别强调的是留学史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结合,特别注重国别文化资源的特殊性意义。

二是宏观与个案。在强调国别史研究的同时,在现阶段还需要更多的个案性研究,也就是说要将留学史(包括国别史)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相当数量的个案之深入探究的基础之上。而在具体研究中,也应更加注重个案研究与大学史、学术史研究的融通维度。这既包括对重要留学人的专门研究,如以陈寅恪为个案,考察其留学多国的阅历;也意味着推出新的研究范式,将留学人留学不同国别、不同大学而获得的不同思想资源转化于现代中国文化场域实践过程之中,如以吴宓、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人研究,就应更看重其分别师从白璧德与杜威的背景,而归国后又分别为“学衡派”、“新文化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史位置,将美国自身思想路径的分化(背后涉及欧洲文化内部异途的世界性思想潮流变更)与中国的思想分化充分结合,将现代中国更具体地落实到世界场域之中去。

三是现代与传统。我们在考察以现代为主体的留学史进程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复归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对思想资源的主动汲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沉入历史”。譬如对于中国而言,更长距离的留学史迹需要仔细爬梳,如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留印历程究竟是怎样的?而日本留学僧、留学生的来华历程,同样也值得细加清理。而注意到现代的维度,则涉猎范围既以文化史、思想史为关注中心,同时又更加关注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动功能,使得单纯的留学史、文化史研究通过思想史这一中介,更密切地与社会史、政治史结合起来。

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从留学史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提供一种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主要文明成长过程的新的观察角度,或许,可以由此更好地揭示出发现某种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可能。至少可以承认的一点是,舒新城当年所指出的事实至今并无根本改变,即:“现在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或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